

辛子陵 著

毛澤東全傳



制、文、出、版、社

文革悲劇



辛子陵
著

毛澤東全傳



利文出 版社



毛澤東全傳

卷四：文革悲劇

著者

辛子陵

出版

利文出版社

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Tel: 381 8251-4 Fax: 397 1519

美國

華文書報雜誌社

發行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Inc.,

330 So San Gabriel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Tel: 818-285-8178 818-285-8479

Fax: 818-289-0488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十二樓

版次

1993年9月初版

ISBN

962-7766-11-9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卷四 目錄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部長忠心	一次犯顏再次犯顏	主席武斷	說有高潮就有高潮
												全包統管	個體戶吃大鍋飯	敲鑼打鼓	資本家過共產關
												集思廣議	建國大政定方略	天馬行空	躍進高潮捲狂瀾
												幫黨整風	知識界忠言逆耳	引蛇出洞	毛澤東翻臉無情
												共產會盟	尼基塔欲執牛耳	坐而論道	毛澤東口若懸河
												違心檢討	周恩來治國難兩全	階級鬥爭	毛澤東牧民有奇術
												南巡千里	化日光天說假話	鶴鳴一聲	忠朋憂國吐真言
												勞民傷財	忍飢挨餓	五億農民進食堂	元帥微服訪故鄉
												領導讀書	領袖糾「左」定基調	探求真象	奴隸主出奔流亡
												炮打金門	亂起邊陲	子珍上山	萬民詛咒大躍進
												大地呻吟	江青闖帳	不堪回首話往事	無限風光在險峯

119	118	117	116	115	114	113	112	111	110	109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評儒論法	紫氣東來	宣講天才	製造偽證	冒死諫言	倒賀防周	口蜜腹劍	羅織罪名	中樞分裂	千夫所指	十年總結	血口噴人	忍辱蒙羞	林彪出台	疾風勁草	元帥上書	爲黨爲民爲社稷
批孔子暗批周公	毛澤東會晤尼克松	老夫子廬山失寵	看后黨天良喪盡	譚震林大罵武則天	彭德懷入川上當	彭羅陸楊陷牢獄	彭羅陸楊陷牢獄	澤東另立司令部	三面紅旗皆褪色	羞答答澤東認錯	赫氏制華加壓力	撤退專家	彭德懷違心檢討	左嚙一聲定基調	潤之理短	論平衡而談民主
治理整頓	周恩來扶持鄧小平	謀殺領袖	元首屈死	急升陡降	心毒手黑	譟張爲幻	江青秘下上海灘	後黨崛起	迷途知返	八字方針	轉移視線	助毛爲虐	劉少奇當衆失言	元帥息影掛甲屯	文過拒諫	重臣議政
爲百姓不爲君王	周恩來扶持鄧小平	周恩來扶持鄧小平	毛澤東圖窮匕首見	戚本禹小丑跳梁	林康陳張上舞台	江青秘下上海灘	江青秘下上海灘	八大路綫指航程	亂紛紛恩來回天	八大路綫指航程	毛公反修逞英豪	元帥息影掛甲屯	劉少奇當衆失言	宣講《七發》作高深	君爲貴兮民爲輕	見仁見智見靈魂
514	494	472	453	437	419	401	385	366	346	327	309	294	278	262	241	222

120 天怒人怨 「武則天」難承大統

機關算盡 毛澤東撒手塵寰

結束語 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555 531

部長忠心 一次犯顏再次犯顏

主席武斷 說有高潮就有高潮

一九五五年三月上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找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杜潤生匯報工作。毛澤東肯定了他離京期間劉少奇、周恩來為緩解農村的緊張形勢所發出的文件和所採取的措施。對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他說：「方針是三字經，叫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當場共同議定，浙江、河北兩省收縮一些；東北、華北一般要停止發展；其他地區（遼解放的新區）再適當發展一些。

四月二十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有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鄧子恢等參加的匯報會，確定「今後總的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達成的共識是：「合作社已發展到了六十七萬個，其中過多的省份有超過二、三萬社的，主觀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縮一些。」在五月十日、十七日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重申了「停、縮、發」的方針。

於是，整頓、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工作在全國展開。

當時，浙江省農業社發展最快，有比較嚴重的強迫命令和侵犯中農利益的情況，自然成為整頓

的重點省份。

中共上海局二月九日的報告說：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中旬，浙江省合作社已從去秋的兩千零一十六個發展到四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個，擴大了二十倍。由於攤子大，問題很多，必須踏步一個時期，以便集中力量做好鞏固和整頓工作。但上面掀起的「左」風正烈，竟至煞不住車，發展到了五萬三千多個社，並且「還有近萬數的自發社」，入社農戶接近全省農戶的百分之三十，少數地區的合作社竟比去年增加了五十倍。許多地區爲了辦社，幹部宣佈入了社少派徵購任務，不入社要多派；有的爲了土地聯成片，強制調換單幹農民的土地；甚至在動員會上有的幹部說：「入社是走毛澤東的道路，不入社是走蔣介石的道路。」有的農民感到不入社政治上沒出路，只好勉強入社。說：「合作社就是死路一條，我也要入了。」（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央書記處二辦副處長袁成隆在浙江調查後寫給譚震林的信）

三月二十四日，譚震林、鄧子恢與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對浙江省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形勢進行了分析研究，根據毛澤東既定的對浙江農業社要收縮的精神，共同擬了一個中央農村工作部給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的電報，稿子擬好後由陳伯達送毛澤東看過，於三月二十五日發出。電報建議「能鞏固好三萬個社，仍承認是很大的收穫」。浙江省委常委在霍士廉主持下對中央農村工作部來電進行了研究，一致表示同意，並召集地、縣、區、鄉四級幹部會議做了部署。經一個多月的工作，全省共收縮了一萬五千個確實不具備條件的社，鞏固下來了四萬個。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單獨約見鄧子恢。提出：「全國合作化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個五

年計劃完成三分之一，十五年在全國完成合作化。」鄧子恢聽後說：「中央批准的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的規劃，在一九五七年組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毛澤東又改了中央批准的控制數字，堅持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三分之一，不要百分之五十了。

這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七日，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上，鄧子恢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在五月六日的總結中分析了農村出現緊張形勢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他說：

（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私商改造，）這三種都是造成緊張的帶根本性的因素，同意同志們的意見。當然應該承認，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十二月以前，那時我也感到糧食問題壓到我們身上，但是去年十二月以後，今年一月以來，我越看越感到合作化是主要的。我們這裏有好幾個人回家的，沒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沒有什麼亂子，那些地方也有統購統銷，就是沒有合作化，一個合作社也沒有，所以那些地方有牲口的就不那樣恐慌，這是很明確的。當然，牲口大批的殺賣也與糧食統購統銷有關，不是沒有關，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鄧子恢強調反冒進，指出「冒進現象不是全國性的，比較多一點的是少數的省份……比如浙江、山東、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覺幹部中的冒進情緒是帶普遍性的。這種冒進情緒如果不講清楚，如果不克服，它將來還要冒進，今天不冒進，明天冒進，今年不冒進，明年冒進」。冒進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對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對農民的小生產的本質認識不

足。……有些地方農民覺悟是有高漲，比如社辦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礎，互助組有基礎，互助組辦得比較多，比較好，社會主義旗幟在那個地方有個榜樣，那個地方農民的覺悟當然就有高漲了，這個不可否認。但是你說那樣的普遍高漲，普遍的高潮，沒有看到不平衛，這樣看也是不對的，這只看到了他的表面，沒有看到他的本質；只看到了表面現象，沒有看到他的內心。把這個高潮估計過高，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這是主觀主義的，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是實事求是的，而是爲表面現象所迷惑，不從本質上看，就是不看究竟辦好了多少社，互助組究竟辦得怎樣，合作社辦得怎樣，已經有多少合作社擺在那裏，不是從這個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興興，雙手舉起來，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認爲他們是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這樣看會使我們犯錯誤的，就助長了幹部的冒進情緒。

第二個原因，對合作化是改變生產關係，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最深刻的階級鬥爭這一點認識不足，因而對把合作社辦好，對增產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產，那是很費勁的，那除非天老爺保祐它。認爲只要插上社會主義旗幟就增產了，那就不是唯物論。要把合作社辦好，真正增產，內部團結好，樣樣上軌道，樣樣制度化，不是那樣容易的事情。

對今後的方針政策，鄧子恢宣佈了四條：

(一) 要求一般停止發展。原來我們說今年秋天停止下來，以後主席說，乾脆就停止

下來，到明年秋後再看，停止一年半。

(二) 立即抓生產，全力鞏固。老社十萬個，新社五十幾萬個都要鞏固。

(三) 少數的省是要適當的收縮。丟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極的退卻，是爲了更好地前進，更好地鞏固。

(四) 把互助組辦好，整頓好，照顧個體農民，這就是爲了搞好生產，爲了將來合作社的再發展。

毛澤東出巡到了上海，見了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中共高層幹部中承歡媚上之徒，柯慶施是個代表人物。他摸清了毛澤東好大喜功，急於實現全國合作化的心理，對毛澤東說：「黨內有百分之三十的高中級幹部和基層幹部反映中農的情緒，不贊成搞社會主義。」這個觀點影響了毛澤東，改變了毛澤東十五年實現全國合作化的比較穩健的規劃，毛澤東認爲農民是聽他的話的，主要是幹部作梗。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毛澤東回北京參加「五一」紀念活動。五月五日晚，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提出：「一九五七年化個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鄧子恢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爲好。」

毛澤東說：「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鄧子恢沒有跟上思想急劇變化的毛澤東

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華東區、中南區和河北、天津、北京等十五個省市委書記會

議，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對他的「停、縮、發」三字經重新作了解釋，主要強調「發」。說「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

六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農村工作部的匯報，批准了一九五六年在現有六十五萬個社的基礎上發展到一百萬個的計劃。因毛澤東出外巡視，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劉少奇說：「明春發展到一百萬個，關一下門，辦好了，讓中農自願前來敲門，關鍵是保證中農自願。」

六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又找鄧子恢談合作化問題，他認為政治局會議定的到明年春天發展到一百萬個太消極，提出要翻一番，六十五萬翻一番就是一百三十萬個。鄧子恢建議還是一百萬個，不要變動了。講了六條理由：（一）整個合作化運動應與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二）現有的六十五萬個社存在的問題很多，鞏固任務相當繁重，要打好基礎；（三）地區之間羣衆的覺悟水平不同；（四）幹部的領導經驗尚待積累；（五）會計的培養訓練頗費事；（六）蘇聯和匈牙利農業合作化過急的教訓應加以注意。

談話間與毛澤東發生爭論。

七月十一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杜潤生、劉建勳，並要譚震林也參加，一見面毛澤東就重申自己翻一番的意見，批評鄧子恢，鄧子恢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毛澤東不悅，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談話持續了五個多小時。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寫信說：「請將上次農村工作會議各項材料，如報告，各人發言和結論，送我一閱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國農村會議的文件，據以作靶

子，着手撰寫《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問題》，用重炮轟鄧子恢。這件事情，是對鄧子恢，也是對劉少奇。發展一百萬個社是劉少奇於六月十四日政治局會議上定的，毛要鄧子恢加碼到一百三十萬個，鄧不同意，毛認為不僅是三十萬個社的問題，是他能不能左右政治局的問題，是鄧子恢跟劉不跟毛的問題，是誰代表中央的問題。毛澤東超越於政治局之上的最高權威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作題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他說：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衆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羣衆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通觀毛澤東這篇演說，高屋建瓴，頭頭是道，把個鄧子恢和主張穩步發展合作社的幹部，批的抬不起頭來。從形式邏輯來看，毛澤東的推理是嚴密的，環環相扣，無懈可擊。但這一番大議論的前提是農民到底有沒有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這是通篇立論的基礎。毛澤東說有，很大，而且是高潮，這種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鄧子恢認為：「把這個高潮估計過高，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這是主觀主義的，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實事求是的。」毛澤東認為這種不同的認識，「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這確實是兩條路線的分歧，這是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和科學社會主義路線的分歧。

毛澤東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腸認識問題的。他充滿感情地說：「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作為貧苦農民的救星毛澤東，第一步領導農民把土地從地主手裏奪過來分給了貧苦農民。貧苦農民中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經過三四年勞動發家，上升到了中農的地位；還有些沒有升上來，或由於孩子多勞力少，或由於主要勞力有病和死亡，或由於不會經營，或由於好吃懶做等等，總之，還有一些困難戶。毛澤東作為人民領袖關心這些困難戶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辦法是政府拿出錢來救濟這些人，但毛澤東領導下的政府百廢待興，拿不出錢來。再一個辦法就是富幫窮，具體辦法就是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政府不要拿出錢來，把農民組織在一起解決了富幫窮的問題，而且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窮的變富，富的更富，政府從農民手裏拿到了更多的錢去發展工業，那該是多麼樣的好，多麼樣的妙呢!!!

毛澤東要防止兩極分化，要富幫窮，這在道德領域是無可非議的，但在科學領域是落後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土改後的小農經濟，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發揮出來沒有？遠遠沒有。其人格化的表現就是那些跟着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的貧苦農民們，好日子還沒有開始，或者是好日子還沒有過夠，他們一腦子發家致富的計劃還沒實施，就被逼着入了合作社。組織合作社，改變一家一戶爲單位的小農經濟，這是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物質條件」呢？沒有。只是把中農（包括原來是貧雇農的新中農和老中農）的驥馬牛歸到社裏來共同使用，所以激出了一個出賣和宰殺耕畜的高潮。劉少奇堅持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就是要創造更高的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毛澤東要把事情顛倒過來，堅持先合作化，後機械化，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是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所以他堅持辦起來的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頓，整頓了幾十年也沒有整頓好，直至他死後全部垮台，回到包產到戶。這是歷史唯物主義不可抗拒的規律。

所謂貧富「兩極分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並不是絕對的壞事。恩格斯說：「文明向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進一步。」「可是這種進步包含着對抗，它同時又是退步。」（《反杜林論》·哲學編第十三）把不平等當作絕對的壞事，一輩子提倡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的毛澤東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學。「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況。我們決不會想到要重新恢復這種狀況，至少因爲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況中必然要產生階級差別。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階段，才

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爲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持久鞏固，並且不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衰落」。（恩格斯：《流亡者文獻·論俄國的社會問題》）

由此可見，有兩種防止「兩極分化」的辦法：一種是把社會拉向倒退，回到野蠻人和半野蠻人的「沒有任何階級差別」的狀態，那當然是普遍的貧窮，在普遍貧窮的條件下求社會平等，中國古代的空想社會主義，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張「不患貧而患不均」；另一種是把社會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義憤填膺的喧嚷，允許競爭，允許會經營的人先富起來，在生產力大發展，社會財富普遍增加的條件下，「使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爲真正的進步」「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衰落」。前一種辦法是毛澤東的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所採取的辦法；後一種辦法是鄧小平「包產到戶」的辦法。

中共在反思歷史的時候，企圖以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爲界，在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確的，在這以後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其實，公社化高潮是合作化高潮的必然的歷史發展，在合作化時期對生產力的破壞雖已相當嚴重，但還沒有推向極端，直到公社化、大躍進使生產力遭受了大破壞，從根本上危及中共和毛澤東的政權的時候，才不得不退回來。當時，劉少奇主張「農業上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毛澤東認爲這是復辟資本主義，堅決反對，折衷的辦法是所謂「三級所有，隊爲基礎」。三級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隊爲基礎就是以生產隊爲經濟核算的基礎。實際上，保留公社名義，是爲毛澤東保留面子，隊爲基礎就是退回初級社階段。退到這一

步，並沒有使中共在農業上擺脫困境。二十多年來，許多農民付出了溫飽和生命的代價，換得了年年「豐收」的虛假數字，維持着所謂「到處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國還有上億農民終年不得溫飽，多數農民缺吃少穿，某些農村的貧困落後竟不亞於解放前。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以來，在實際政策上摒棄了合作化那一套，「農業退夠」回到了「包產到戶」；但理論上只退到了一九五八年，還在宣揚合作化的正確性，這種理論和政策的矛盾就為否定現行政策（包產到戶）留下了理論的和歷史的根據。在中共黨內極左思潮有時潛流有時洶湧的當代，中共領導人如何使自己立於無懈可擊的地位，請慎思之。

讓我們仍然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在毛澤東作《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問題》的報告以後，各省市自治區、聞風而動，開展了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到十一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擴大）全會。陳伯達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鄧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的說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彭真等在會上發了言。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為主題作總結，又有驚人之論，他說：

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他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